

郭店

XINCHU JIANBO YANJIU CONGSHU

新出简帛研究丛书

李学勤◎主编

竹书

别释

GUODIAN ZHUSHU
BIESHI

陈伟 著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

郭店楚墓竹简于1993年冬清理出土，1998年5月成书出版，总共只花了半年的时间。虽然对于关心这批资料的国内外众多学者来说，感到等待已久，但在大批量战国简牍整理公布的运作中，郭店简的速度要算是很快的。同样出土于荆门市境，1987年初发掘，1991年10月出书。



K877.54
C583

QIYANJIU CONGSHU

新出简帛研究丛书

李学勤◎主编



郑州大学

04010225906T

郭店竹书

别释

陈伟 著

GUODIAN ZHUSHU
BIE SHI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

K877.54
C583

2003/04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郭店竹书别释/陈伟著. —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
2002

(新出简帛研究丛书/李学勤主编)

ISBN 7-5351-3424-6

I. 郭… II. 陈… III. 竹简文-研究-楚国
(? ~ 前 223) IV. K877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6361 号

出版 发行:湖北教育出版社

网址: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

邮编:430015 传真:027-83619605

邮购电话:027-83669149

经 销:新 华 书 店

印 刷: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版 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字 数:175 千字

(430077·武昌岳家嘴特 1 号)

4 插页 8.25 印张

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5 01-25 00

ISBN 7-5351-3424-6/K·107

定价:21.00 元
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,承印厂为你调换

总序

ZONG XU

呈献在诸位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，是现今学术界的一项前沿研究，即简帛书籍研究的最新成果。

历史上每个时期的学术研究都有其前沿，而什么是当时的前沿，常是由一些重大的发现决定的。简帛的发现、整理和研究，近年已成为热门。特别是最近几年，由于有学术价值极高的简帛材料公布，这方面研究更明显地处于前沿地位，形成国内外学者集中的焦点。一系列新发现的讯息，在会议或著作里提出的观点，都屡次为媒体突出报导，吸引着公众的注意。什么是简帛，简帛有哪些内容，研究简帛有怎样的意义，对学术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，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。

简帛乃是中国古人用来书写文字的主要载体。简制以竹木，至少在商朝即已有了；帛则是丝织品，作为书写材料要晚一些。简帛的性质，大体说可以区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，其他如书信、遣策等当附属于后者。简帛在古时非常普遍，然而因为质地脆弱易坏，多已消失无存，只有少数幸得保留于地下，为后人发现。

大家知道，历史上为人艳称的这方面发

现，有“孔壁”、“汲冢”。“孔壁”系西汉景帝末年，封于曲阜的鲁共王修建宫室，拆毁孔子宅墙，发现了为逃避秦火匿藏的书籍，有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数十篇。

“汲冢”是西晋武帝时，汲郡人盗发战国魏墓，出土竹简七十五篇，有《纪年》、《师春》、《琐语》及《易经》等。这两次发现都是书籍，在学术上造成很大影响。此外，史书所记零星发现还有不少，只是不如这两次量多，影响也很小而已。过去发现的这些材料，原物均未留传下来，今人无法得见。

现代发现简帛，始于百年以前，即上一个世纪交替的时候。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，二十七年（1901）英国所派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，都发现了木简，年代多为魏晋。此后西北木简出土不绝于书，但性质系以文书为主，其间书籍很少，而且限于初学用书及占卜数术之类。

书籍的集中出土，首推 1942 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发现的一批帛书。不过其文字不易释读，加上除一件完整的以外长期没有著录，在学术界的影响有限。后来，1957 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所出竹简有一些被指为“最早的战国竹书”，1959 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《仪礼》木简，也很珍贵，但只是在专业学界范围内得到重视。

70 年代初，情况有了急遽的转变。1972 年，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大量竹简书籍，包括《吴孙子》即《孙子兵法》、《齐孙子》即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尉繚子》等兵书，以及《晏子春秋》等等。两《孙子》的并出，消除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疑谜，引起了震动性的效应。随之，1973 年发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

汉墓简帛，1975年发现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，1977年发现的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，等等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构成了影响深远的浪潮。大量简帛“惊人秘籍”的出现，迫使学者们对学术思想史的若干根本问题作重新审查和思考。

与70年代发现的简帛书籍年代为秦汉不同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，乃是战国中期不晚于公元前300年的竹简佚书，而且兼有儒、道的著作。这批竹简于1998年5月公布，立即把简帛研究推向新的高潮。关于这一点，只要看郭店简整理报告出版当月，在中国和美国都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，便足以说明。在美国达慕思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内容已辑为《郭店老子——东西方学者的对话》一书，先后出了英文版与中文版。

另一批楚简，发现时间估计同郭店简差不多，其年代也相接近，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。上博简包括儒家等方面书籍，据报导有约八十种，也激起学者的极大兴趣。

郭店简、上博简的讨论，迅即成为各次有关研讨会的中心。这样的会议，可举出1999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“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学的“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2001年9月在长沙的“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2002年3月在清华大学的“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7月在上海大学的“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8月在安徽大学的“新世纪历史文献前沿论坛研讨会”。会议的频率加增，显示出学术界热度的升高。

简帛书籍的发现研究作为学术的前沿，带动了不少学科的进

步，影响是多方面的；但关系最直接、影响最重大的，显然是学术思想史。我曾再三说过，由于简帛的出现，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，这是没有任何夸张的。实际上，因为新发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，对古代学术思想看法的改变，同时也必然波及对后世，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思想问题的认识。在这一点上，关于 20 世纪学术思想史中疑古思潮的讨论，可说是很好的例子。

1998 年 9 月，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了“20 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”。会上不少学者在讲话里提到简帛研究在该方面的作用。疑古的一个主要内涵，是对古书的怀疑，而简帛书籍的发现，确实给大家很好的机会，对疑古思潮所达到的结果进行衡量。国内外都有些学者担心，在疑古的论点被否定后，将导致陈旧的信古的复归。我以为这种“危惧”其实是不必要的，简帛研究所带来的只是对传世古书更严密、更实事求是的考订审查。对于疑古思潮的进步性应有充分肯定，对其不足及副作用则须补充和修正，并提高到方法论上来反省。国内已有若干论作谈及这类问题，国外也有学者论到（如浅野裕一《战国楚简与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再检讨》，《中国出土资料研究》第六号，2002 年 3 月），这也是简帛研究影响的一种重要表现。

清华大学鉴于这方面研究的前沿意义，在 1999 年秋天启动了基础研究项目“出土简帛与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”。承担这一项目的，除思想文化研究所外，还有中文系和法学院的学者。我们举行了简帛讲读班，设置了系统讲座，编印了《清华简帛研究》第一、二辑，与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作出版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论文集》，并同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一起主

办了上面提到的“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研讨会”。研究所还培养有关方向的研究生。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都得到很多位同行学者专家的大力帮助和支持，在这里要特别表示感谢。

目前简帛书籍的研究正是方兴未艾，不断有新材料出现发表，内容珍异，种类繁多，促使整理与研究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继续发展，新的成果层出不穷。现在这套丛书就是环绕简帛与学术思想这一前沿主题，作多角度、多层面的探讨。

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出版丛书的湖北教育出版社。读者都熟悉，湖北教育出版社历年来印行过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著作。各位编辑先生从一开始就关切我们的项目，给予多方面的协助，现在又投入大量心力，使这套丛书及早问世，对此我们当长志不忘。

李学勤

2002年10月18日

于清华园

凡 例

一、以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（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5 月）为底本，如无特别需要，引述原释文、原注释与裘锡圭先生按语时，不一一交待出处。

二、释文在无特别需要时，径直采用后世通行用字，不严格按原形隶写。如古—故、乍—作、少—小、胃—谓、女—如、可—何、隹—唯虽、圣—声、才—哉、訢—慎等等。合文、重文一律分开抄写。原有的标识符号略去。

三、残字与未能释写的字用“口”表示，拟补的字用【】括出，衍文用〔〕括出，脱文用（）表示，讹文后用〈〉注出正确的字。

四、行文采用简体字。为免致误会，偶尔也使用繁体字，如第十四章“六”中的“豐”。

五、章目略分三种，只讨论一些局部性问题的称“零识”，对竹书通篇讨论的称“校释”，另有两章侧重讨论编连问题。

六、有时为便于说明字形，将竹书图版扫描后以附表的方式插入。单字大小和对比度或有调整。附表以章为序。如第七章的第一表编号为“表 7—1”，第二表编号为“表 7—2”。

郭店竹

书

别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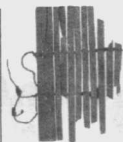
郑州大学

04010225906T

目 录

GUODIANZHUSHUBIESHI

- 一/ 总序 李学勤
- 凡例
- 一/ 绪言 文本复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
- 一五/ 第一章 《老子》甲组零识
- 二三/ 第二章 《大一生水》校释
- 三三/ 第三章 《缁衣》零识
- 四五/ 第四章 《鲁穆公问子思》零识
- 四六/ 第五章 《穷达以时》零识
- 五二/ 第六章 《五行》零识
- 六〇/ 第七章 《唐虞之道》校释
- 七四/ 第八章 《忠信之道》零识
- 八三/ 第九章 《大常》、《德义》、
《赏刑》三篇的编连问题
- 一〇九/ 第十章 《大常》校释
- 一三五/ 第十一章 《德义》校释
- 一五二/ 第十二章 《赏刑》校释
- 一七三/ 第十三章 《性自命出》诸简编连问题及校释
- 二〇八/ 第十四章 《语丛一》零识
- 二一八/ 第十五章 《语丛三》零识
- 二三〇/ 第十六章 《语丛四》校释
- 二四五/ 附录一 附表细目
- 二四六/ 附录二 作者有关论文目录
- 二四八/ 后记



绪言 文本复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

一

郭店楚墓竹简于1993年冬清理出土，1998年5月成书出版^①，总共只花了4年多的时间。虽然对于关心这批资料的国内外众多学者来说，感到等待已久，但在大批量战国简牍整理公布的运作中，郭店简的速度要算是很快的。同样出土于荆门市境的包山楚简，1987年初发掘，1991年10月出书^②，是战国简牍中公布周期最短的一批。郭店简所用的时间，很接近于包山简。在不太长的时期内，将全部竹简资料整理、公布出来，并附上整理者的初步成果，以利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，这在反映整理者专业方面高水准的同时，也显示出他们学术上强烈的责任心和道义感。

郭店简共800余枚，13000余字。由于岁月侵蚀和经过盗扰，编绳朽烂，一些简残断，出土时呈现一派散乱无序的状况。经过整理者细致的缀合、编连、释文、注释，加上裘锡圭先生精心审订，大致已是篇章分明，文句可读。在此基础上，不仅古文字学者可以集中精力考析疑难，对古文字学不大了解的文献史、思想

① 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。

②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：《包山楚简》、《包山楚墓》，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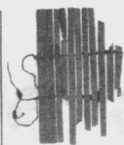
二

史学界也可以比较方便地加以利用^①。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工作。

应该承认，与其他战国楚简相比，郭店简的整理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。除竹简保存较好、字迹大都清晰如新之外，至少还有三点可以举出：第一，经过几十年间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积累，对战国楚系简帛文字的释读已有很好的基础。第二，在 730 枚写有文字的竹简中，按照简身长度、两端修削形式、编线道数与相间尺寸以及文字风格等因素，可以分出若干群组，使得编连、分篇能够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，减轻了工作强度，而可靠性和准确率则大大提高。第三，也是最为重要的，简文内容全部是古代典籍。其中有的大致相当于传世或先前出土的古书^②，可以直接对照；有的语句或词汇见于传世古书，可以比勘参考；在这以外的场合，也往往可以通过句式、文理或语境，找到某些线索。楚文字中有一个从“羽”从“能”的字，自 20 世纪 50 年代首见于《鄂君启节》后，古文字学界有过多种解说。郭店简《五行》有“淑人君子，其义能（上从羽）也”一句，是引述《诗·曹风·鸛鸣》。在今本《诗经》和马王堆帛书本《五行》的引述中，这个字都写作“一”。据此，整理者将楚系文字中的此字读为“一”，而有关争辩至此应可定讞。这是通过与已知文献对读以解决问题

① 庞朴先生作为哲学史专家，对《语丛一》77、82、79 号简顺序的合理调整（《初读郭店楚简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8 年第 4 期）；彭林先生作为古代史专家，对《性自命出》34、35 号简文的正确阐释（《〈郭店楚简·性自命出〉补释》，《中国哲学》第 20 辑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），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。

② 前者如《缁衣》，后者如《五行》，《老子》则既有传世本，又有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本。



的最好实例。而在一般楚简里常见的充满生疏用语、行文简略的丧葬与卜筮记录之中，或者像包山简包含的人们以前完全不熟悉的行政、司法文书中，这样的机会几乎难得碰到。

然而，虽然有种种便利条件，并且经过专家整理和审订，郭店楚墓竹简释文中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仍然不少。我们看到，任何一批时代较早的出土文献，都会在原始资料公布之后有一个历时较长、由较多相关学者参加的讨论过程，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阐释上，达到较高的水平，形成大致的共识。对于用古文字写成的先秦竹简资料来说，由于文字辨识和简序排定上的难度，尤其如此。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或期待，是很不切实际的。

二

具体说到郭店简文本复原的问题，几乎存在于先秦时代以竹简形态保存的出土资料整理的所有环节，即识字、句读、编连、分篇等各个方面。

文字辨识的问题有三种情形：一是释文原来缺释或者释读无把握的字，实际上有可能作出合理的说明；二是释文原有的意见，存在推敲的余地；三是原释文对字形的释读虽然可从，但对辞义的给定却可能不够准确。

第一种情形，可以举在《性自命出》15—20号简、《尊德义》17号简以及其他多篇中都有出现的当读为“文”的字为例。在原释文中，此字仅作隶定，裘锡圭先生在按语中写道：此字“与‘𡗗’有别，但亦应从‘且’声，疑即‘𡗗’字异体。‘且’与

四

“度”“序”古音皆相近。”^①后来，李天虹博士率先指出，此字在简书中当读为“文”^②；李家浩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个字见于《古文四声韵》、《汗简》引石经，为古文“闵”字^③，从而使相关简文得到通释。又如《语丛三》48号简说：“思亡强，思亡其，思亡邪”。最后一字原无释。实则此字从糸牙声。古文字义旁从“糸”从“衣”可通，所以此字应可释为“衰”，通作“邪”。简文是摘取《诗·鲁颂·驹》一、二、四章中的三字句而成^④。

第二种情形如《唐虞之道》7号简说“孝之杀爱天下之民”，《语丛一》103号简说“礼不同、不奉（丰）、不杀”，《语丛三》40号简说“爱亲则其杀爱人”，“杀”字原皆释为从方从虫之字，读为“方”或“妨”。其实此字即《说文》“杀”之古文，《礼记·礼器》记孔子语说“礼不同、不丰、不杀”，适与《语丛一》103号简相同，可见当改释为“杀”^⑤。又如《唐虞之道》7、8号简说：“孝，仁之大也。番，义之至也。”“大”原释为“免”，很难理解。通过字形比较，我们发现这个字恐当释为“大”，前后两句话正好为对句，“大”与“至”正好为对文，文意因而变得显豁^⑥。

① 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182页注[一〇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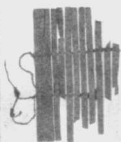
② 《释楚简文字“度”》，《华学》第4辑，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8月。

③ 张富海：《北大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“郭店楚简研究”项目新动态》，“简帛研究网”（<http://www.bamboosilk.org>）2000年10月。参看李学勤：《试解郭店简读“文”之字》，《孔子·儒学研究文丛（一）》，齐鲁书社2001年6月。

④ 详看本书第十五章“三”。

⑤ 详看第七章“三”。

⑥ 详看第七章“三”。



第三种情形，可举《五行》21号简中的“弁”与《唐虞之道》12号简中的“畏”为例。《五行》21号简中段的文字写作：

“不弁不悦，不悦不戚，不戚不亲，不亲不爱，不爱仁。”弁，原注释说：“读作‘变’。帛书本作‘般（下从月）’，但解说部分解释经部此句时则作‘变’（见帛书第二三三行）。”^①我们知道，弁、般以及由从得声之字往往有喜乐义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“弁彼鸛斯”，毛传：“弁，乐也。”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般，乐也。”简书中“弁”如字读，或依帛书本经部读为“般”，训为乐，似于义更洽^②。《唐虞之道》12号简上端原释文读作：“口礼畏守乐孙民教也。”按该篇10号简中段、下段及12号简，都是讲述虞舜时代的功臣。释文已经指出的有禹、益、后稷（以上在10号简）及皋陶（12号简中段）。在上古音中，畏、夔读音相近，有辗转通假的例证。据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等书所记，舜的功臣依次为禹、后稷、羲和、伯夷、夔、皋陶等人，其中伯夷主礼，夔作乐。依照次序和职掌，可知礼当是讲伯夷的事迹，而“畏”则当读为“夔”，是简书记述的另一位人物^③。

在对《唐虞之道》12号简上段作如上理解之后，原来连读的文句也必须断开，成为“口礼，夔守乐，孙民教也”。10号简中下段写道：“禹治水，益治火，后稷治土，足民养【也】。”正与此句式相同。这是句读上需要改变的一例。类似的情形还有许多。如原称为《成之闻之》篇的13号简原读作：“戎（农）夫务

① 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152页注[二六]。

② 详看第六章“三”。

③ 详看第七章“三”。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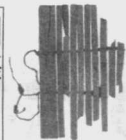
食不强，加粮弗足矣”。裘锡圭先生按语已疑“粮”上一字也许不当释为“加”。周凤五先生将此字释为“耕”，并改属上读^①，似更为可信。句读的改变有时会使语义呈现重大的歧异。今本《老子》十八章说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；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”简本《老子》丙组 2、3 号简一段释文作：“故大道废，安有仁义。六亲不和，安有孝慈。邦家昏【乱，安】有正臣。”有学者认为简本《老子》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的文字，这段释文被作为一条主要证据^②。但也有学者指出释文这种处理与老子原意恐怕正好相反，怀疑几个“安”字读为“焉”，应属上读，为语末助词^③。

前面提到的《唐虞之道》10 号简的下端，在据文意和残存笔画补充“也”字之后，还有大约两个字的缺文。而在十二号简顶端，也有一个字的缺文。依照这两枚简的文例和《大戴礼记》等书的记载，这残缺的三字大约是“伯夷守”。这意味着，12 号简当直接列于 10 号简之后，而原来位于二简之间的 11 号简则需要另作安排。在《语丛一》中，原释文有两条简文，一条由 31 号简与 32 号简合成，读作：“礼因人之情而为之，（31）善里（理？）而后乐生。（32）”一条是 97 号简，读作：“即，度者也。”在 31 与 32 号简之间，我们很难看出有什么联系。《礼记·坊记》记云：“礼者，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，以为民坊者也。”

① 《郭店楚简识字札记》，《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》，台湾学生书局 1999 年 1 月。

② 郭沂：《从郭店楚简〈老子〉看老子其人其书》，《哲学研究》1998 年第 7 期。

③ 庞朴前揭文。



以此比照，恐当以 31 号简与 97 号简连读^①。《语丛一》原释文中还有分别由三枚简和两枚简组成的两段话。由 77、78、79 号简组成的一段为：“□□□于义，亲而/□□；父有亲又尊；/……尊而不亲。”由 82、83 号简组成的一段为：“不尊厚于义，尊（博）于仁/人亡能为。”此外竹简残片第八号写作“仁人也义”。在《礼记·表记》中录有孔子的一段话说：“仁者，人也；道者，义也。厚于仁者，薄于义，亲而不尊；厚于义者，薄于仁，尊而不亲。”依此，当以第 8 号残简、《语丛一》77、82、79 号简为序编连，内容与这段孔子语录略同^②。所谓《成之闻之》一篇在简序排列上问题尤为突出。有学者试作大幅度调整，从而使得语句和文章脉络更为通顺。整理者将本篇定名为《成之闻之》，是取自原来排在首位的 1 号简开头四字。调整后，1 号简位于本篇中部，并且“成之”与“闻之”之间应该断读，不当作为篇名，这是简序调整的一个副产品^③。

与同一篇中竹简顺序的局部调整相比，原为一篇简书的离析、甚至原有数篇简书之间的调整，具有更大的挑战性。原释文《性自命出》诸简，一直有学者怀疑应分作两篇^④。上海博物馆藏简

① 参看拙文：《〈语丛一〉、三中有“礼”的几条简文》，《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5 月。

② 参看廖名春：《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》，《孔子研究》1998 年第 3 期。上揭庞朴文也已指出除 8 号残简以外三简的正确顺序。

③ 郭沂：《郭店楚简〈天降大常〉篇疏证》，《孔子研究》1998 年第 3 期。参看本书第九章。

④ 参看廖名春：《郭店简〈性自命出〉的编连与分合问题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00 年第 4 期；本书第十三章。